

杨永生
编

建筑

百家回忆录

续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www.cnipr.co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建筑百家回忆录续编

◆ 杨永生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www.cnipr.co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内容提要

本书是2000年出版的《建筑百家回忆录》的续编,在该书引起社会响应的触动下,编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多方收集、整理了70余篇文章,再现了建筑界许多活生生的历史画面,记录了建筑界前辈们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感人事迹,为很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展现出许多有骨有肉的历史场景,是历史教科书不可或缺的补充,更具有启迪后学的重要意义。

本书可供建筑师、建筑院校师生、建筑历史工作者和文化界人士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百家回忆录续编/杨永生编. -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3

ISBN 7-80011-730-8

I. 建… II. 杨… III. 建筑师-回忆录-中国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1601号

建筑百家回忆录续编

杨永生 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电话:010-62024794)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6号;电话:010-68331835 68357319)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经销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印刷

787mm×1092mm 16开 18印张 482千字

2003年8月第1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000册

定价:38.00元

ISBN 7-80011-730-8

TU·055-1010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知识产权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邮政编码 100088, 电子邮件: oojian@263.net yangsanshui@vip.sina.com)

编者的话

在2000年编辑出版《建筑百家回忆录》以后这两年来,建筑学界的一些新老朋友都说,那本书给他们再现了许多活生生的历史画面,并鼓励我再编一本续编。今年年初,我给一些朋友发出了约稿信,有的还不客气地指定了题目。这样做,无非是想在内容上作些补遗。因为建筑史上有些重要的人和事在以往的书刊上几乎没有记载,人们都不知道。于是,在这本书里除了编入特约为本书撰写的几十篇文章外,还摘编了我过去看过的书刊里一些感人的事迹。此外,还配上了一些人物照片以及与文章内容相关的照片。还需要说明的是,有几篇文章并不是回忆录,而是研究论文,考虑到其史料价值,作为特例也编入本书。

历史是人创造的,建筑史当然也不例外。这本书里所展示的许多有骨头有肉的历史场景,并非枯燥的概念说教,无疑对建筑史教科书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补充,因而也更具启迪和教育意义。无怪乎有些教授告诉我,他们给学生上课,还不时地引用《建筑百家回忆录》中的一些事例来启示学生。

我在晚年之所以有兴趣花了半多年的时间,广泛搜集资料,多方联系,动员大家写回忆录,无非是想为建筑学界的青年朋友提供一些精神滋补。

杨永生

2002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编者的话	杨永生
1 追忆中的日本	梁思成
4 回忆阎子亨	赵今声
5 正阳门城垣的改建	朱海北
7 角直罗汉塑像修复记	李嘉球
8 怀念启蒙老师徐中教授	吴良镛
9 忆恩师——沈理源先生	王炜钰
15 拓者多风采 遗荫给后人——记近代建筑先驱者沈理源	沈振森
19 岭南建筑教育创始人林克明	刘 业 黄朝捷 黄 翼
21 记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	温玉清 孙 炼
27 我在延安从事建筑工作的经历	杨作材
33 怀念恩师、前辈和同窗好友——回忆我的学习生涯	刘光华
45 怀念鲍鼎教授	黄康宇
47 怀念黄作燊	罗小未 钱 锋
61 怀念德高望重的前辈建筑学家王华彬	金瓯卜
63 往事杂忆	白德悉
66 忆 1939~1943 年的之江大学建筑系	沈玉麟
69 中国建筑师学会后期活动纪实	胡金钻
72 怀念窗友张之凡	汪国瑜
77 老去情亲旧日师	陈从周
79 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	吴良镛

89	怀念林徽因	陈从周
90	和善可亲的长者——梁思成	汪国瑜
91	梁先生不是保守的人	王其明 茹竞华
92	忆先师梁公	杨鸿勋
93	思念我们的“老伙伴”	黄 汇
94	敬爱的师长金经昌先生	李锡然
96	大时代里小人物的感悟	钟华楠
100	五十年沧桑——回顾国家建筑设计院的历史	张钦楠
107	全国第一家国营建筑设计院成立情况——庆贺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 成立五十年	金瓯卜
111	陈登鳌忆毛主席和周总理	李 沉
113	刘少奇与梁思成	袁镜身 杨永生
114	恩泽绵长——忆杨老	钟训正
118	杨廷宝的建筑学术思想——纪念杨廷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齐 康
131	一代巨匠 万世师表——纪念杨廷宝教授诞辰一百周年	奚树祥
135	我们了解的袁镜身先生	陈世民
139	纪念慈同志的几个重要观点	张钦楠
140	怀念戴念慈同志,漫谈设计思想	萧 桐
142	卓越的才华 高尚的品质——记余峻南	宁泉驊
145	徐中先生的生平——论他的教学思想、科研态度、学术观点与为人	周祖爽
150	徐中先生	聂兰生 章又新
152	天津大学建筑系办学特色与徐中先生	胡德君
154	忆徐中先生	钟训正
156	不弃愚钝,点化成形——记徐中老师的一次教学评图	邹德依
158	《透视建筑教育》——献给徐中老师的书	荆其敏
160	徐中先生与天津大学建筑系的成长——纪念徐中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彭一刚
163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春秋录	常怀生
167	难以忘怀的好领导阎局长	杨永生
169	阎子祥与中国建筑学会	张祖刚

171	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的导师吴景祥教授	唐玉恩 等
175	长留念记在人间	马国馨
180	怀念陈占祥先生	马国馨
186	勇于实践,不断追求——忆一代宗师夏昌世	何镜堂 刘 业
189	谋深艺湛——忆洪青	胡耀星
196	吾从周	喻维国
205	陈从周先生追忆	薛求理
209	宏扬地方特色 高举亚热带旗帜——记陈伯齐教授	刘 业 郭昊羽
211	忆恩师李剑晨教授	王国梁
213	我所认识的陶逸钟先生	程泰宁
216	永远的导师 永远的怀念——纪念龙庆忠百年诞辰	陶 邨 刘 业 谢少明
218	留给人间一片阴凉——追忆与陶德坚先生的交往	张伶伶
221	漫把哀歌悼中年	曾昭奋
225	为了来日的回忆	吕富珣
226	张开济谈国庆十周年工程	王 颂
227	回忆毛主席纪念堂设计过程	袁镜身
247	在内罗毕的日日夜夜	徐尚志
259	由三首诗引起的回忆	黄为隽
261	东岳“飞虹”——泰山索道架设记	袁镜身
264	忆三晋古建筑考察	张驭寰
266	临汾十年	程泰宁
268	随同张开济大师考察民居	黄为隽
272	潘祖尧当了一回“月老”	曾 坚
273	为金茂大厦合作设计赴美追忆	张皆正
276	上海图书馆设计手记	张皆正
278	大师永在——建筑设计大师张镈学术贡献追忆	金 磊 李 沉

追忆中的日本^[1]

梁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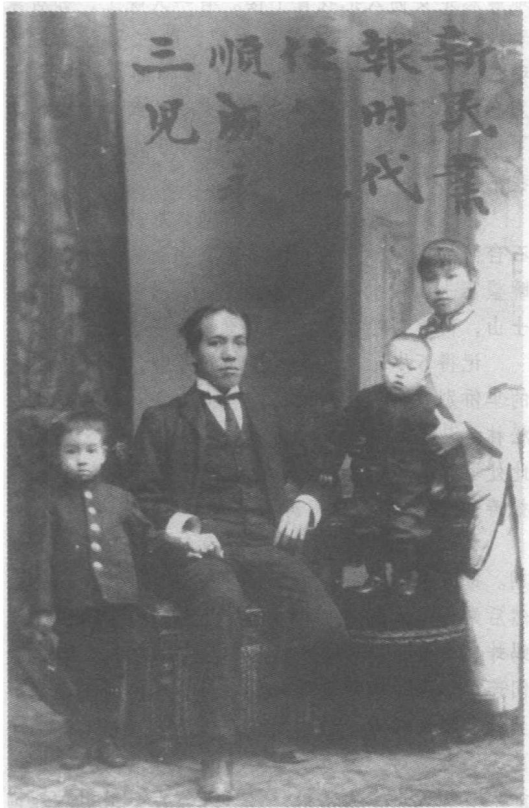
自懂事开始到1949年，近50年间的日本对我来说，总是交杂着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憎的矛盾思绪。随着时光的流失和形势的变迁，我对日本的憎恨和厌恶占据了上风，以“七七”事变为界，对日本的爱情完全冷却下来。

然而，现在又再次燃起对日本的无限爱意。

我于1901年在东京出生。当时正值戊戌变法3年后，我的父亲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母亲与当时5岁的姐姐一起从广东故乡逃难到日本。一家人在日本住下来，先后在东京、横滨、神户、须磨等地居住过，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返回祖国。我在日本度过了11年的童年时代。

回到祖国后的52年间，曾两次踏上过日本的土地，但那只是横跨太平洋途中匆匆忙忙地过港，简直就是疾驰而过的旅行。初次是在1923年，第二次是1946年。所以，留存在记忆中的日本大多是我童年时代的事。

尽管印象已有些淡薄，但对日本的怀恋之情与童年时相比没有丝毫改变，在我心中深深植下了根。我的记忆从横滨开始，那时，父亲正担任《新民丛报》主编，我们就住在《新民丛报》社二层，记得是山下町二丁目，是很热闹的地方。我上的是华侨经营的大同学校附属幼稚园，虽是华侨经营，老师却都是日本的女教师。她们就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对我们循循善诱，关爱备至。当淘气摔倒把膝盖蹭破时，老师就过来一边哄着不要哭，一边为我涂药包扎。伤口疼痛不能行走时，老师就抱着把我送回家。这些事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记忆中，历历在目。



1905年父亲梁启超与我们兄弟在横滨^[2]

左起：梁思成、梁启超、弟弟思永、姐姐思顺

日本地震很多，记忆中，居住的房子可怕地摇晃就有好多次。缠足的母亲上下楼梯很困难，每次

梁思成（1901～1972年），广东新会人。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1928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1946年又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均任系主任、教授。1931～1945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他的著作已于2001年出版《梁思成全集》九卷。

地震总是女佣人把我背下楼。有一天晚上，邻居家着火，通红的火焰烤灼了天空，映红了窗子的玻璃，一瞬间抱起熟睡的我跑下楼梯的，还是女佣人。那天夜里在怀抱中看到的火焰的颜色和慌忙跑下楼梯的女佣的脚步声，在60年后的今天，仍让我难以忘怀。

在横滨，还有一处无法忘却，那就是有着很长石台阶的山腰，是姐姐经常带我去玩耍的地方。为眺望富士山，也曾到郊外去过。从那里远望到的富士山，简直与绘画和照片中看到的姿态一模一样。

记得6岁时，一家人搬迁到须磨，居住在海边的华侨别墅中。宽敞的庭院朝向大海，房后是一片松林。从早到晚都能够听到松风和潮声，父亲就把此处取名为“双涛园”（如此称呼是因为能够听到松涛和海涛）；并以双涛园主人为号。

在双涛园的4年间，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时期。每天与兄弟一起沿田间小道步行到鹰取车站，然后乘火车到神户的同文学校上学。野花、野草、蚂蚱、青蛙之类，都令我兴趣盎然。在检票口，我们连票都不用查便会被顺利放行。登上火车，乘务员就会亲切招呼，热心照顾。每遇迟到乘车，火车已缓缓开动时，乘务员就会从舷梯把我抱上列车。如果有一天没有去学校，第二天肯定会很担心地询问是否生病了。迟过开车时间时，乘车员会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劝说，早点起床，一定要遵守时间，火车可不会等人哦（实际上，为等我们，故意推后几秒钟开车的事不止一次）。在上下学的列车中，经常乘车碰面的职员、工人、学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暑假尤其令人愉快，因为可以尽情地游泳。气温不上升到80华氏度，母亲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去游泳。可是，温度计怎么也升不上来。于是，我就偷偷地又是吹气，又是用手摩擦温度计，好不容易把温度升到了80度的刻度上，想如此骗过母亲，

雀跃地奔向大海。然而，这种小伎俩最终还是被母亲识破。母亲说，那就把温度计放下来看看，无奈，只好放下来，可悲的是，还没有过1分钟，就下降到了80度以下。这只手不再有效，当只差一二度时，就去死气白赖地央求严厉的母亲。这时，母亲便无可奈何地许可放行。那时特别高兴的事就是父母亲为我找来了游泳教练，教练在海滨浴场开有卖柠檬汽水的小店，留着小胡子，30岁上下，游泳很棒，教练方法也特别对头。他原是海军退役军人。成为他的学生后，我们也成了小店的好帮手，勤杂工的事情干完后，他检查完，便会很慷慨地招待我们吃饭。这样，跟着教练学习游泳持续了好几年，现在想起来，当时一定是父母亲拜托教练来照顾我们。总之，教练是位善良的好心人，也非常风趣，尽管名字已经有些淡忘了，但他的容貌至今仍清楚记得。

我还记起在双涛园的草地上骑自行车的情景。7岁时，我看到长我3岁的堂兄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得意地骑着兜圈，我也很想骑，可没有办法，再加上脚也够不到，只好放弃。就这样忍受了近1年，1907年，总算能够踏到脚蹬了，于是也得到了骑自行车的权利。时至今日，我还是喜欢骑自行车，一则为了运动，不出远门时还非常方便。

节假日，一家人会聚在一起去箱根、奈良游玩。奈良的鹿、各地的樱花、箱根的红叶让年幼的我欣喜若狂，颇具风味的红叶油炸食品很好吃。其实，我对日本的普通食物、酱汤、萝卜咸菜、烤鱼、馒头、车站的盒饭等都非常喜欢。特别是在须磨附近取访山松林中采集松蘑，刚采下的松蘑用枯树枝烧烤后吃下去的绝妙味道无法用语言描述。童年时好吃的东西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回到中国后，日本令人喜欢的印象渐渐被打碎了。回国后，先是在天津安顿下来。那里有日本的租界，租界内有坏蛋一样的警察，那些警察虽是中

国人，但最擅长的却是欺辱中国人，其总头目是日本警察，更是坏上加坏，与在日本见到的人相比，与其说相似，不如说一点都不一样。在日本租界内，除警察外还有军队，他们也不把中国人当人看。正因为如此，我一见到日本警察和军队的影子便躲得远远的，对日本的爱渐渐蒙上了憎恨。

这些事情不必多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年初，弟弟思忠（当时担任大队长）在上海事变中战死。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日本军队占领了我居住的北京，为所欲为。我携带全家离开北京，在长沙遭受空袭，炸弹就落在距离我们不到三四十米的地方，几乎丧命。尽管从死亡中逃脱出来，房子的一半被刮掉，邻居和附近的人有的被炸死，有的被压在房子底下伤亡。1940年初，参加空军的内弟林恒战死。在国民党腐败的政治下，我曾向往着投笔从戎，但始终没有机会，也没有想到去延安。逃难到云南、四川，在那里闷闷度过了8年的时光。那些日子，我充满了对日本的仇恨。

1946年路过日本时，我曾想以“战胜国之人”的身份耀武扬威、春风得意地踏上日本的土地，然而，上陆后，这种心情很快就消失了。日本是我的出生地，我还是爱着出生的“故乡”，感觉到日本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善良、亲切，不同的是他们充满了忧郁。到处可以看到美国兵横行的情景，而且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状态一模一样。就在这一刻，我对日本的仇恨转化为同情。即使这样说，仇恨的情感彻底去除是不可能的。

1949年，中国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的思考也一天天改变，最终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热爱的是日本人民和日本美丽的自然，以及其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应该憎恨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此后十数年，日本人民始终推进着反对美

帝国主义的斗争，且逐年高涨。我以激奋的心情，一直关注着这一斗争，从内心深处声援着日本人民的不懈斗争，并对他们的斗志深表敬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就再也没踏上过日本的土地，间或从去过日本的许多人那里了解日本的近况，再加上在北京幸运地见到石原宪治、西山卯三、田边原人等日本建筑师及其他友人，他们把日本出版的与建筑相关书籍、杂志寄赠给我，这种热烈的友情成为我忘却内心对日本仇恨的巨大力量。

去年，在日本和中国举办了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纪念鉴真和尚促进两国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不朽贡献，在鉴真宏法的故土扬州大明寺要建设纪念堂，我被荣幸地选为设计者。我仿照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的风格设计了该纪念堂，理由在于，金堂虽是日本建筑，但却是唐代建筑传承的产物。以金堂的形式和风格纪念鉴真和尚，象征千余年来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最为恰当的。

设计过程中，我猛然会记起童年时与父母亲一起去奈良出游的情景，想到大佛殿，巨大的正殿正在维修，父母亲捐出一日圆的香资，把我的名字刻在瓦片上。当唤起这种回忆时，我不由得沉浸在返回日本的心绪中。对日本的怀恋之情就像那瓦片一样，无法飘离诞生处日本“故乡”的土地。

（原载《梁思成全集》第5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编者注

[1] 原载1964年6月日文版《人民中国》杂志，中文原稿已遗失。现此文系吴耀东由日文译出，经王炳麟校对。

[2] 此照片系原发表时作者所附。

回忆阎子亨

赵今声

辛亥革命以后,香港大学曾派工科主任史密斯教授(Middleton Smith)到大陆各省政府介绍香港大学情况,希望各省派学生到港大学习,加强文化交流。

应香港大学要求,河北省(当时称直隶省)政府教育厅决定在香港大学设置八个公费生名额^[1],于1914年录取刘振华(刘仙洲)、阎书通(阎子亨)、石永澄、赵铭新、贾士清、史维华、齐振庸等八人赴香港大学学习。以后凡有公费生在港大毕业,即由河北省教育厅招考新生递补。

阎书通毕业于著名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在香港大学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回到天津,创建中国工程公司,从事房屋、桥梁、闸坝的设计施工业务。这个公司享有盛名,曾设计和建造过许多民用住宅及公共建筑^[2],以风格朴素浑厚,工程坚固耐久著称。海河整理委员会为防止永定河洪水威胁天津市,于本世纪20年代设计了屈家店分洪节制闸,向天津市北郊洼淀分洪放淤,由中国工程公司承包施工。该闸已使用60多年,至今仍在运用。这个公司还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等设计修建了校舍。阎子亨任南开校友会会长,热心公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将其所建住宅多套捐献给天津市人民政府,受到表扬。他参加组织了天津市工程师协会^[3]。晚年任天津市政府园林处处长,为天津市绿化美化环境作了贡献。

他为人正直,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尊重。

1926~1927年,我在天津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执教期间,在天津的香港大学校友有阎子亨、贾世清、官士恩、李新慧、于桂馨、赵铭新等,我们每月在永安饭店聚餐一次,每次大家都出席,相谈甚欢。大家都称阎子亨为阎大哥。他是天津有名的企业家,同学中惟独他有私人汽车和司机。聚餐时,大家都要求阎大哥买酒、栗子粉、冰激凌招待。他还请大家吃过熊掌。聚餐会开得热烈、友好,大家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摘自赵今声(曾任天津大学副校长,港大1926年毕业生)于1991年1月撰写的《香港大学的河北省籍同学》一文。该文刊于香港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书)

编者注

[1] 当时,学费每年港币300元,饭费每月港币24元,书杂费每学期港币60元,每人每月还有10元零用钱,全由河北省供给。

[2] 中国工程公司的设计作品有: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南开中学范孙楼、天津女师学堂大礼堂、北洋大学工程学馆和工程实验馆、耀华中学体育馆、寿德大楼(今天津和平路东方饭店)及一些住宅建筑。

[3] 从1953年到1966年,阎子亨曾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1~第4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正阳门城垣的改建

朱海北

北京正阳门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原名丽正门，是明、清两代内城的正门，正统四年（1439年）改名正阳门。它与南面的箭楼、北面的中华门坐落在一条中轴线上，组成了庄严宏伟的建筑群。旧时，城楼的中门专供御驾通行，官兵日常出入只能绕道瓮城东西两侧“券门”。北面的棋盘街宽敞开阔，白天为商贩聚集之地，夜晚常有人在此赏月、乘凉。清人有诗云：“棋盘街阔净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正阳门城楼正面分列两座庙。东面供奉观音大士，庙内原有明朝万历壬辰年竖立的《建筑都城碑记》和清书法家、刑部尚书张照的

书法石碑。西面为关帝庙，也有一石碑，为明书法家董其昌手笔。正阳门和箭楼瓮城外侧为荷包巷和帽巷两条街肆，清人《都门杂咏》曾如此描绘：“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形容了当时该处商店林立，五色杂陈，百姓接踵而行的热闹景象。后来京奉、京汉两条铁路建成，箭楼东西两侧建立了车站，正阳门前就成了北京客货运输的枢纽，车水马龙，十分拥挤。

民国3年（1914年），先父朱启铃^[1]任内务总长期间，为改善正阳门前交通状况，曾向当时的总



1962年朱启铃90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为朱先生设宴祝寿



改建后的正阳门外东侧马路及京奉铁路北京站

统袁世凯呈陈《修改前三门城垣》的方案，并于民国4年6月16日付诸实施。正式开工时，先父手持一把重约30余两的白银鹤嘴镐，冒雨登上城墙，拆下第一块城砖。此鹤嘴镐的红木手柄上嵌有一道银箍，上刻“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字样。这一文物由先父珍藏，文革期间曾被抄去，发还前加贴“故宫博物院”标签。现仍保存于我家中。^[2]

正阳门改建工程须清运渣土8500多立方，由于将京汉、京奉两条铁路道轨延伸铺至东西瓮城根下，渣土就及时沿东西两侧装卸外运。东线运往东便门外蟠桃官，西线运到西便门外洼地，既平整了土地，又缩短了工期。

当年12月29日，工程全部结束，共费银元29.8万余元，其中包括偿付征用民房的拆迁费7.8

万元。正阳门改建后改善了交通，美化了环境，拆下的旧料也物尽其用。千步廊的砖瓦木料均运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添盖了一息斋、绘影楼、春明馆和董事会，为这座园林添了几处胜景。

（李彝陵改写）

（原载中央文史研究馆编《史迹文踪》，上海书店出版）

编者注

[1] 朱启钤（1872~1964年），字桂莘，晚年号蠖公，贵州开阳人。清末曾任京师内城及外城巡警厅厅丞、邮传部丞参兼津浦铁路北段总办。辛亥革命后，历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并一度代理北洋政府总理。1930年创建中国营造学社并任社长。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并兼任文物修整所顾问。

[2] 后来，此鹤嘴镐由朱海北赠给清华大学建筑系，现藏于该系。

甬直罗汉塑像修复记

李嘉球

苏州吴县甬直为江南名镇。镇上有一始建于南朝梁代的保圣寺。寺内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圣寺罗汉塑像。塑像原有十八尊，相传为唐代开元年间雕塑家杨惠之的作品。这批塑像千百年来历经沧桑，至20世纪20年代，已损毁严重，全赖当年顾颉刚、蔡元培、叶恭绰等人的全力抢救，才得以保存至今。

1922年夏，顾颉刚来甬直省亲，看到保圣寺大殿正梁已经断裂，塑壁毁坏，罗汉残破，极为痛心，当即请同来的陈万里为剩余的罗汉拍了照片。回北京后，顾把照片分寄蔡元培、沈兼士，请他们设法保护。蔡接信后便与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美专联系，建议他们会同甬直教育会会长沈柏寒商讨保护办法。沈柏寒曾为此致函苏常道尹蔡师愚。蔡以修复工程所需七八万元巨款难以筹集，塑像无法修复，仅在塑像四周围起栅栏了事。

无奈，顾颉刚便写了一篇题为《记杨惠之塑像——为1100年前的美术品呼救》的文章，在1923年7月1日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呼吁社会各界“抢救唐塑”。商务印书馆总编译高梦旦先生见报后，立即致函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蒋维乔，商讨抢救办法。经各方努力，筹集了一笔款项，遂雇请苏州塑佛匠人陶子泉，把达摩等五尊塑像拆下，放在寺旁甫里先生祠中保存。这年7月，蔡元培与周峻在苏州举行婚礼，胡适从北京寄来架信，建议蔡先生发起修缮塑像，以作新婚纪念。蔡、周欣然响应，在旅欧度蜜月之前，捐银百元以为倡导，请留在苏州的亲友经营此事。12月，顾颉刚又将有关杨惠之的史料和罗汉照片，交发行量较大的《小说月

报》发表，从而引起了更广泛的反响。1925年，南开大学陈彬和将该期《小说月报》函寄日本国美术史教授大村西崖。大村对此极感兴趣，遂于1927年春来甬直考察。回国后，大村著《塑壁残影》一书，介绍了这些罗汉塑像的历史价值。

1928年，叶恭绰先生见到大村的书，便亲到甬直，主持将尚存的九尊塑像清理出来，放在甫里先生祠的光明阁，并发起成立“唐塑保存会”，上书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请求拨发修缮款项。不久，“保存甬直唐塑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叶恭绰全面负责，蒋梦麟、马叙伦、蔡元培、顾颉刚、陈万里等19人为成员。

在蔡元培院长的支持下，大学院拨款1万元，江苏省政府拨款3000元，又另筹1万元，开始了修复工作。保存会接受吴敬恒的意见，将拟议中的建筑命名为“古物馆”。决定聘请建筑师范文照负责建筑设计，雕塑家江小鹣负责塑像修复。徐悲鸿、刘海粟等人也专程到甬直考察研究，参与制定方案。最后决定在原来大殿旧址上建造一座宽敞的罗马式大殿。工程展开后，因江小鹣另有要事，遂派他的助手江苏青年雕塑家滑田友到甬直，具体负责修复塑像事宜。工程告竣后，谭延闿题写了馆名，蔡元培撰写了《甬直保圣寺古物馆记》，由马叙伦正楷书写，黄蔚萱刻碑，立于古物馆中。1932年11月12日，保圣寺古物馆举行开馆仪式，周峻女士为之剪彩。

（原载江苏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吴风采》，上海书店出版）

怀念启蒙老师徐中教授

吴良镛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参加徐老师 90 诞辰的纪念活动和铜像揭幕典礼，许多往事又映入脑际。

我是在 1940 年战火纷飞的时代考入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大一班在距重庆沙坪坝校本部几十里外的柏溪分校，第一位授课老师就是徐中教授。当时，他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风华正茂，建筑的入门课阴影透视及建筑设计初步全由他讲授。他每周末一次，我们班是空前的大班（其实不过 12 人），从校本部来往需坐“滑竿”长途跋涉，回去时已疲惫不堪。到了二年级以后设计课的教授增多，谭垣、杨廷宝教授和徐先生轮换教我们直到毕业。教授们各自教学风格是不一样的，但徐先生严谨、认真、细致，花在我们每个学生的时间最多，还和我们一起讨论，参加班里的一些活动，至今仍留下不少回忆。作为教育家的徐先生对中央大学建筑系的贡献还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谈。抗日战争初起，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仓促内迁重庆，校舍全部临时修建，条件很差，师生生活很艰苦。这时有的教授家眷尚在沦陷区，加之其它种种原因，建筑系一度在风雨飘摇中。幸后来由鲍鼎教授主持系务，徐中教授回国，谭垣教授留下，并增聘杨廷宝、李剑晨教授等来校任教，不仅稳定下来而且阵

容增强。后刘敦桢先生又来校。在这大转折的过程中，徐先生除了担负繁重的教学工作量外，还辅佐鲍先生，为建筑系的中兴贡献极大，这是我们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铭记在胸的。

徐中教授对建筑教育的另一贡献是在建国以后北上，先在唐山交通大学建筑系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后，创建天津大学建筑系。因为同在京津，我与徐先生较多机会晤面，包括同出席一些会议及出国活动等。我理解天大建筑系的创建固然有唐山交通大学及天津北洋大学建筑系的基础，但徐先生在系的建构、师资的延聘、天大的建校、设计的教学等竭尽全力，基础筑就，直到今天，天大能作为全国名列前茅的少数建筑院校之一，得益于它在基础教学，教师队伍的建设，设计基本功的训练，建筑设计的全面发展等等有它的特色。几十年来，天大毕业生中，院士、教授、大师等高水平的设计人才相继出现。饮水思源，这些和徐先生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可惜的是在他的晚年，徐师母和徐先生相继卧病，而“左”的路线也影响了他的才能和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作为徐先生的学生每为此深感惋惜。尽管如此，在他的铜像前回顾往事，重温这位虔诚的建筑教育家的业绩，益增怀念之情。

忆恩师

——沈理源先生

王炜钰

每当我的设计作品受到奖励，或受到肯定的时候，总是会很自然地带着感激之情，怀念我的老师们对自己的教导和培育，而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在专业上的引路人，沈理源老师。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先驱者

中国近代早期的建筑先驱者沈理源先生。生于1890年，1950年去世，享年只有60岁。沈理源先生在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建筑历史研究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建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日伪时期、新中国等五个历史阶段，所以他又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的亲历者。沈先生1915年从意大利学成回国，比我国公认的第一代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杨廷宝先生等还要早10多年。他所经营的华信工程司比从事建筑设计的庄俊建筑师事务所成立的时间还要早。因此，今天来评价沈理源先生，将他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多个角度来看，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建筑先驱者。沈理源先生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一生，无论是在他所经营的华信工程司，还是在国家部门，或是在建筑院校的讲台上，都曾留下过大量不朽的丰碑。

沈理源先生虽然从他留学归国工作到他去世只有短短的35年（1915~1950年），但是这一阶段他在国内的建筑作品已有40多例（见附表）。无论是从建筑类型之多，规模之大，还是建筑作品的数量，都可以称之为“最”。他的作品丰富多彩，从西洋古典建筑风格、折衷主义风格到摩登建筑的风格；从普通砖混结构的小住宅到大距结构的剧院、银行、商场等类型的公共建筑，论“质”、论“量”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国内很少有建筑师能与他相比。

究其原因，首先应追溯到我国近代建筑历史的发展。在清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洋务派”，他们对“洋风”建筑（主要是西洋古典建筑形式）十分“向往”，如圆明园中的西洋楼景区的建造即可以说明当时清末统治阶级对“洋风”也有所追求。这对于社会上“洋风”建筑的风行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20世纪20年代初期“西化”思潮在国内盛行，达到了高潮。反映在建筑界，就是对西洋古典建筑形式的追随。沈理源先生自1908年到1915年留学意大利，在意大利拿波里大学学习，“拿波里”（Napoli）现名“那不勒斯”（Naples），它是意大利仅次于罗马和米兰的第三个大城市，拿波里地区在古希腊时代，就建有相当著名的神庙，修建了著名的庞贝古城，到古罗马中世纪时，拿波里已经发展成为意大利半岛上一个文化先进、经济繁荣的大城市。从地理位置看，拿波里位于意大利的中部，其东岸就是闻名于世的庞贝古城，其北部即是据有悠久历史建筑文化的罗马城，再向北就是佛罗伦萨和水城威尼斯。由此可以看出拿波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拿波里大学的周围环境，为建筑学子们提供了良好的实物教材，建筑艺术的光辉，使每一个来到意大利的外国人，都会激动不已。何况到这个艺术殿堂来求学的中国青年——沈理源先生。沈理源先生擅长于西洋古典建筑风格的设计，也是由于得益于他在拿波里大学学习时的深厚的基本功，和优异的学习环境。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西洋古典风格的建筑有着广泛的市场，而在当

时像沈理源先生这样的人，学自西方古典建筑的发源地，又能够掌握纯正的西洋古典建筑的构图原则、比例关系、建筑特点的中国建筑师真是“凤毛麟角”，“首屈一指”了。根据有关资料，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师前辈庄俊先生，他所创建的建筑事务所是在1924年，而沈先生1918年设计了北京劝业场（现新新服装公司），1920年设计了北京真光电影院（现儿童艺术剧院），而他创办的华信工程司是在1921年之前已经建立。因此沈理源先生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的先驱者！

二、一位建筑大师、一位教书育人的好老师

沈先生不仅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建筑师，而且他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他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天津工商学院（天津大学的前身）都曾担任过建筑系主任、教授，并且亲自翻译、出版英国人弗莱彻（Banister Fletcher）所著的《世界建筑史》。这是我国第一本中文的《西洋建筑史》，很长一段时间这本巨作成为建筑教学中西洋建筑历史的重要的参考教材。

沈理源先生留学的这段时间，正是欧洲建筑界折衷主义和新建筑运动并行时期，这时期建筑的特点是古典建筑的巨大感染力和现代建筑的强有力冲击交杂在一起。这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建筑学子，当然沈理源先生也不例外。他对西洋古典建筑，尤其是文艺复兴建筑的形式与做法有着特别深邃的造诣，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又可以看出他的设计特点是力求突破古典的模式，去追求新的创意。这一点可能与他在国外所接触的建筑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的记忆中，沈先生在设计课堂上，与别的老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言教身教”、“以身示范”。不论是多么复杂的建筑细部，总是不厌其烦地在学生草图的旁边，用铅笔徒手画出它的细部，而且边“画”边“讲”。一个西洋古典建筑的外檐

很快地几笔勾勒出来，特别是细部的处理。他不但为学生仔细分析它的比例关系，而且分析在运用时怎样和建筑的大比例关系结合，怎样会使人感到“隽秀”，怎样会使人感到“庄重”，应该怎样去注意人的视觉角度的“错视”。他在讲解的时候，总是用剖面来说明问题。沈先生的谆谆教诲，真是让我们有“顿开茅塞”之感。沈先生对西方古典建筑的博大精深在于他对西方古典建筑神韵的掌握，而作为我们学生则更深地感受到的是：他作为教师对学生亲切的关爱，认真负责的态度，崇高的无私奉献，以及他那满腔热情的治学精神。我记得当时沈先生教我们设计课的时候，他同时在天津工商学院也兼课，而且在天津还有他自己的华信工程司的一些工程任务。所以，每周都要京津两地往返，十分辛劳，但是在课堂上，看到的沈先生总是那样热情饱满地在“讲”、在“画”，在“评析”学生的作业。有时为了给学生的设计解决一个具体的设计问题，甚至用半小时以上的时间，还在“不厌其烦”地讲。经常可以看到下课铃声已经响了很久了，而沈先生还没有离开课堂，我们都知道他在校外的工作很忙，不敢在课时外去讨教，恐怕耽误他的宝贵时间，但是沈先生却常常因为对学生的设计太“投入”而主动地约学生到北京的家里“改图”，作个别辅导。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在我大学期间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学术渊博，在教学上诲人不倦，在设计上一丝不苟的好老师，真是终身难忘。现在回想起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几年，但在自己的工作中，还会不断地反映出他的教导、他的传授、他的影响。“恩师的教诲，受益终身”。

三、历史为证——一位值得纪念的积极

拥护党的先进者

沈理源先生的一生，不只是一个职业建筑师的一生，同时他对中国建筑的多方面发展作出过积极